

文化中国行

■人文对话

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从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等首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25年西夏陵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这40年，是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中国从世界遗产大国迈向保护管理强国。

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总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经验与启示。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遗产走向世界，更多中国经验惠及全球。

——编者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 珏

访谈嘉宾：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刘曙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郑军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主任 熊军

深入挖掘世界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记者：我国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

郑军：40年来，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前列，保护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申遗工作，营造了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多公众关注和支持申遗，加入保护传承利用的队伍。

刘曙光：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一是保护法规规划体系初步建立，二是保护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三是保护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四是保护状态全面改善，五是展示阐释基本满足需求，六是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实用、好用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通过监测系统进行数据统计、趋势分析、信息公开，为评估遗产保护状况、制定保护决策提供了客观真实的数据支持。自2014年上线以来，它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工作中均已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全球领先，也备受国际同行赞誉。

通过遗产的保护和申报，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

熊军：西夏陵作为2025年中国申遗项目，实现宁夏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申遗过程中，西夏陵不断健全完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队伍建设、法规体系、资金保障、档案管理、游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在遗产监测、价值阐释、公众参与、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丰富工作内容，构筑起多层次、多角度的科学保护管理体系，积累了经验。

申遗不仅深入挖掘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历史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推动世界遗产从数量领先向质量领先、从单一保护向综合价值实现转型

记者：如何更好推动世界遗产融入社会？

刘曙光：遗产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命题。我们要探索中国世界遗产

新时代申遗捷报频传的背后

设与专家智库建设，组建跨学科专家委员会，加强人才培养与监测系统整合，提升决策科学性与保护精准性。

我们要放开胸怀，守正创新，努力奋斗，立足保护、传承和展示中华文明和历史，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郑军：要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和政策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申遗成功，申遗过程中暂停了一些破坏世界遗产价值的项目。但申遗成功后，就重新启动这些项目，不顾对世界遗产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拿“世界遗产”这个金字招牌当摇钱树。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一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多了一份为全人类保护好世界遗产的责任。申遗成功是政绩，保护好世界遗产是更大的政绩。

此外，要用科技赋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水平。随着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更多的先进科技可以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中。我国在古蛋白质组学和古基因分析、石窟壁画保护、干旱地区土遗址加固技术、世界遗产监测系统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应扩大行业间、学科间的合作，将更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当中。

面对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需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

记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刘曙光：世界遗产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以保护管理为先，第二是以提升内涵为要，第三是以服务大众为本。

在提升内涵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现在中国拥有60项世界遗产，但是我们对早些年申报那些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是不充分的。长城是我国第一批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但当年申报的时候，我们对长城的认识还有不少的局限性。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们做长城资源调查，实施长城保护工程，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长城价值的认识，已经跟当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例如，当年的价值叙述强调了长城的苦难象征。我们现在已认识到，长城的精神魅力和终极价值是文化融合，透过“冲突”，最后看到的是“融合”。当前，许多地方都把自己本地的长城当成世界遗产，但实际上许多地段并没有被列入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要素，也没有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来开展保护、利用和阐释，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郑军：目前，世界遗产保护中很大的问题是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统计，截至目前，有62个国家的103处世界遗产受到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滑坡、生物病害等的影响，有69个国家的97处世界遗产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评估咨询机构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世界遗产的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应注重系统性、预防性和能力建设。系统性是指防灾减灾是系统工程，由国家、地方政府和遗产地，以及气象、地震、消防、交通、通信、电力等各个部门构成。遗产地应充分利用系统的力量，而不应单打独斗。预防性是指遗产地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提升文物自身抗灾能力，通过建设预防性保护设施将灾害抵御在遗产地以外；和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及时获取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制定灾害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并实施；注重发挥传统智慧。

记者：一些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如何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郑军：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世界遗产的利用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以国家为主导，对外展示中华文化，对内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世界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如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和”思想，孔庙体现的儒学文化，天坛、泰山等传递的敬天法祖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取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第二层面是知识技能层面的利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性、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性、故宫的规划范式等，都可以成为科技创新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古代城镇、村庄、建筑等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条件，使人居环境更健康、安全、节能。将这种理论知识与当今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等现代学科结合起来，用于完善当今的规划设计，就是在知识层面对世界遗产的利用。文创开发也能从中汲取文化精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层面包括旅游、居住、商业等活动的利用，直接涉及遗产实体。要根据世界遗产的价值特征、类型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等，合理使用，避免过度利用。

保护与利用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应加强前两个层面的利用，同时严格监督第三层面的使用，实现遗产的永续传承。

刘曙光：中国的世界遗产分布于广阔地域之中，也处于地方发展的不同阶段之中，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同的挑战，但我们已形成两个共识，一是“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申遗成功后，保护与价值阐释仍然是重任。保护需遵循国际标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如大运河申遗时创新采用“系列遗产”申报模式，协调8省份近3200公里河段，建立国家主导的监测系统。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封闭的学术工程，而是开放的社会实践，唯有融入民生、赋能社区、对话世界，方能在保护与利用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图①：北京中轴线。

饶强摄

图②：工作人员在广西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地调试监测仪器。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图③：西夏陵。

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本版责编：王珏

版式设计：张芳曼

■人文茶座

从“种田”到“种风景”

张贺

梯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依山就势，垒土造田，层层叠叠的曲线环绕大山，造就了一种极富动感的美。就拿广西龙胜大寨村的龙脊梯田来说，春季，水满田畴，如镜映天；秋季，层层铺金，绚烂壮观。无独有偶，云南元阳阿者科村也以梯田风光闻名，被评为“最佳旅游乡村”，村民依靠旅游产业收入倍增，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村民们高兴地说，当年“种田吃不饱，今天“种风景”走上致富路。

当前，在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日益受到重视，各地开发乡村文旅资源的热情非常高。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推出159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已有超6万个行政村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众多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庄凭借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一跃而成“网红村”。

但乡村旅游要从“网红”变“长红”，须注意打造共富型文旅开发模式，让村民成为文旅开发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曾经，一些地方在开发乡村旅游时通过招商引资，把村庄和景区承包下来，整体开发，而村民则外迁到新村。这种模式固然可以快速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有利于商业开发，也有利于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但客观上改变了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切断了乡村文脉，使村庄变成“盆景”。村民固然受益，但与投资者相比，收益份额较小。考虑到村民是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这种收益比例失衡的模式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乡村旅游长远发展。

与此相反，有些乡村在开发文旅产业时考虑村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就地就业，参与到文旅全产业链条开发中。大寨村摸索出“一生五金”的模式：流转梯田有租金、入股梯田有股金、维护梯田有奖金、务工梯田得薪金、旅游服务挣现金。村民各尽所能、发挥优势，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阿者科村村民以蘑菇房、梯田、民俗文化等“资产”入股，按比例分红，民宿开发、非遗表演、农家乐等遍地开花，节节攀升的收益使村民普遍受益。

共富型文旅开发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有文化认同的修复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过去，在强势的城市文化和现代文化面前，很多村民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觉得乡村“土”“落后”“贫穷”。而今天，在游客的镜头和赞叹声里，他们重新发现乡土文化的独特价值，看见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智慧、生活方式和风景原来可以让世界为之驻足。文化认同的修复带来了文化自信的提升。当村民们为自己的文化和风景自豪时，珍视、保护、传承就会发自内心而更加主动。

同时，当村民们认识到梯田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致富的希望时，他们会更加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去保护它、修复它、美化它。梯田是活的，只有在持续不断的耕作中，梯田景观才能永续。元阳将“赶海人”“守林人”纳入公益性岗位，不断加大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工程实施力度，梯田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山青水绿天蓝，梯田风貌得到有效保护。

开发乡村旅游，确立村民主体地位，使之普遍受益，就一定会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不竭动力。

■传承

宁夏回族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张建军：

山沟沟里的调调 心窝窝里的歌儿

本报记者 焦思雨

“清水河嘛就弯弯呀，浪声喧呀，连着那黄河的波澜。山花儿嘛烂漫就齐争艳呀，好花儿呀红在了塞上的江南……”记者循声而至，只见61岁的张建军一手捧着曲谱，一手打着节拍，满是轻松惬意。

张建军是山花儿（宁夏回族山花儿）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山花儿”结缘已多载。“1983年，我在固原当兵。那年军民联欢会上，有个老乡唱了曲‘山花儿’。说实话，歌词听不清，但调调美得很！高亢嘹亮的歌声仿佛把人拉到了辽阔清新的山野间，我一下子就入迷了！”

退伍后，一次歌唱比赛上，张建军演唱的“山花儿”，赢得马生林、张明星两位“山花儿”前辈的夸赞：“小伙子，你这嗓子很适合唱‘山花儿’！”此后，他便开始系统学习“山花儿”演唱技法及理论知识。

“尕娃儿，‘山花儿’不是炫技，是真情实感的表达。”师父朱仲禄的这句话，张建军时刻牢记。他回忆起自己唱“山花儿”时的场景，“一首歌唱得好，能把人唱哭，也能把人唱笑。我每次站在台上，满脑子都是歌词里的故事，有时唱完了，还愣愣地站在原地，直到有人提醒才回过神来。”

“‘山花儿’的传承一定要守正创新！”秉持这一理念，张建军对古老、拗口的原生态宁夏“山花儿”进行创编，在节奏和旋律中加入现代元素，演唱中融入信天游、爬山调等技法，实现“老调新唱”。此外，他巧妙运用形体表演传达唱词意境。“很多人听不懂歌词，加上肢体力言，观众就能更好地理解。”

张建军深知，“山花儿”根植在劳动人民的田间地头，30年间，他踏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的乡野村落，走访民间艺人，深入搜集“山花儿”遗珍并编撰成册。正是这份坚守与热爱，张建军创作的“山花儿”独具特色，在全国各类民歌赛事中屡获大奖，收获了“花儿王”的称号，并受邀前往韩国、塞尔维亚、希腊等多国表演。

为了让“山花儿”传播得更远，2013年，张建军在盐池县文化馆建立“宁夏山花儿非遗传承教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山花儿”爱好者，西北大学、宁夏大学等专业院校师生也来交流学习。他还常年下基层、进社区，免费开办“山花儿”培训班，培养出一大批民间高手。

为了让“山花儿”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生根，2020年，他创办“宁夏山花儿”红领巾传承班。“教娃娃们可不容易，得把‘山花儿’编成适合他们唱的调调。”于是，他精心编排了《抓蚂蚱》《雪白的鸽子》等曲目，亲自教授孩子们。他也常常带着这些“山花儿”小学生去校园、敬老院、社区、军营等地。在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歌声中，越来越多的人也爱上了这古老的调调。